
二代流动人口的外部嵌入何以促成城市社会融入？

唐文浩¹

【摘要】 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发展，出生且生长在城市的二代流动人口已成为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城市社会融入度直接关系到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依托社会嵌入理论，从制度嵌入、文化嵌入、认知嵌入和网络嵌入四个维度来解析二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利用 2017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以户籍为代理的制度嵌入和以文化风俗为代理的文化嵌入显著阻碍二代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而以受教育水平为代理的认知嵌入和以社会网络为代理的网络嵌入则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均成立。进一步考察社会嵌入影响的异质性发现，制度嵌入的阻碍效应发生在迁入省会城市和 1.5 代流动人口样本中，而文化嵌入的阻碍效应发生在迁入非省会城市和 2 代流动人口样本中，认知嵌入和网络嵌入的促进作用发生在迁入省会城市和 1.5 代流动人口样本中；机制分析表明，改善社区环境和增强城市感知能够缓解制度嵌入和文化嵌入的阻碍效应，并强化认知嵌入和网络嵌入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二代流动人口 城市融入 社会嵌入 社区环境 城市感知

【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382(2022)01-0058-13

一、问题的提出

人口迁移与流动历来是城市化过程的重要来源之一。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3.9%)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5.4%)之间相差 18.5 个百分点，二者之间的差异反映了社会现实与政策目标的背离，这也表明流动人口对于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作出了重要贡献(周皓，2021)。随着人口流动的普遍化和常态化，流动人口群体内部逐渐分化出一群“生于或长于城市”的流动人口，并日益增多，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第七次中国人口普查公报数据显示，全国流动人口总量达到 3.75 亿人，而 2020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比重达到 50.6%，随着年份的推移，最后所有流动人口都会被包含进来。因此，需要考虑城乡生活经历在流动人口社会分层中的作用，以反映年轻流动人口的本质属性(段成荣和靳永爱，2017)。城市生活与文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二代流动人口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进而导致其社会融入呈现出新的特征，如果二代流动人口无法顺利实现市民化，可能导致其与农村和城市社会的双重断裂，这将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建设进程(张庆武等，2015;路锦非，2018;林李月等，2021)。在此背景下，本文依托社会嵌入理论，致力于解析社会嵌入与二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逻辑关系，以期为城镇化中后期推动流动人口市民化和促进城镇化质量提升决策提供支撑。

国外关于二代移民问题的研究较早，主要从生活环境、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宏观社会结构等方面展开讨论。二代移民是受到父母迁移或流动影响的下一代。Portes 和 Zhou(1993)认为居住隔离在二代移民的社会融合过程中仍然是最重要的障碍，严重阻碍了二代移民与当地居民之间的良性互动与融合。而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职业类型和家庭收入等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方面决定了二代移民能够选择的社区环境、学校条件以及可提供的教育资源，甚至是职业选择(Gans, 1992)。传统的制造业经济为移民提供底层工作的同时，也带来了丰厚报酬，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属于二代移民的劳动力密集型就业岗位逐渐减少，匹配二代移民的就业空间也随之缩小，就业竞争更加激烈，而缺乏途径获得高质量教育的二代移民则失去了向上流动的途径

¹**作者简介**：唐文浩，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后，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南京 21002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住房产权对大城市新市民群体社会融合及治理效能的影响研究”(编号：21BSH038)；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青年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江苏省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研究”(编号：QN202101)

(Zhou, 1997)。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流动人口整体或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市民化及城市融入，但随着流动人口规模急剧增长，流动人口内部出现分化，部分学者开始认识到城乡生活经历在流动人口分层中的作用。侯力和解柠羽(2010)将随父母进城并在城市中接受教育，毕业后留在城市就业与生活的原农村劳动者子女划定为城市农民工二代移民，发现其在城市就业、生活以及社会融入方面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段成荣和马学阳(2011)根据“出生年代”将农民工划分为新生代、中生代和老一代，其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界定为新生代农民工，1965-1979年出生的界定为中生代农民工，1965年之前出生的界定为老一代农民工。梁宏(2011)依据父母外出务工经历特征，将青少年成长时期，父母一代曾有过打工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定义为第二代农民工，并根据少年儿童时期经历将第二代农民工区分为流动一代和留守一代。张庆武等(2015)发现随着流动人口长期扎根城市，在城市出生、上学、成长甚至工作的流动人口越来越多，于是将16周岁以前来京且在京居住5年以上的外地农村户或城镇户定义为流动人口二代。段成荣和靳永爱(2017)根据首次流动时的年龄和父母流动经历，将0-6岁的流动人口划定为2代流动人口，7-15岁的流动人口划定为1.5代流动人口。李巧和梁在(2019)以流动人口子女是否出生于流入地判断其是否为二代流动人口，而林李月等(2021)基于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对二代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与影响因素展开研究。

上述研究丰富了对二代流动人口问题的认识，但多局限于理论上的定性讨论和描述性的定量分析，针对二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研究和探讨相对缺乏。鉴于此，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基于社会嵌入理论，构建二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理论框架，从制度嵌入、文化嵌入、认知嵌入和网络嵌入四个角度深度探析二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内在逻辑，并采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利用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其背后的机制，以期政府选择和制定相关适当的二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政策提供理论基础。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二代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逐渐实现各个层面的融入，是一层层攀爬的过程。具体来看，二代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不仅是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空间转移过程，也是农民向市民的户籍身份转换过程，还涉及生活方式乃至心理状态的多重转变过程(祝仲坤和冷晨昕, 2020)。同时，个人的经济行为及后果均嵌入特定的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社会关系网络之中(Granovetter, 1985)，二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亦是如此。二代流动人口要么完全全出生在城市，成长于城市，要么虽然出生在农村但自小随父母进城，在城市里长大。二代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户籍转换意愿和本地身份认同均嵌入于由户籍制度及其衍生制度构建的体制环境、社会网络、文化规范，并受到二代流动人口自身的知识积累、技能与其他主观认知方面的约束。因此，需要将二代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置于特定的社会情景中加以分析(如图1所示)。

从制度嵌入来看，二代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受到户籍制度以及其衍生的就业制度、土地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等的影响。虽然现在户籍的身份属性在下降，但是与户籍关联的公共服务属性依旧很强，使二代流动人口和本地城市居民享有不同的公共服务、社会福利待遇，甚至使绝大部分二代流动人口无法在城市落户。二代流动人口就业范围往往局限于城里人不愿意干的又脏又累以及充满危险甚至是对身体有伤害的工种，本应受到更大力度的保障，但由二元的户籍制度决定的二元的社会保障制度却把他们排斥在外。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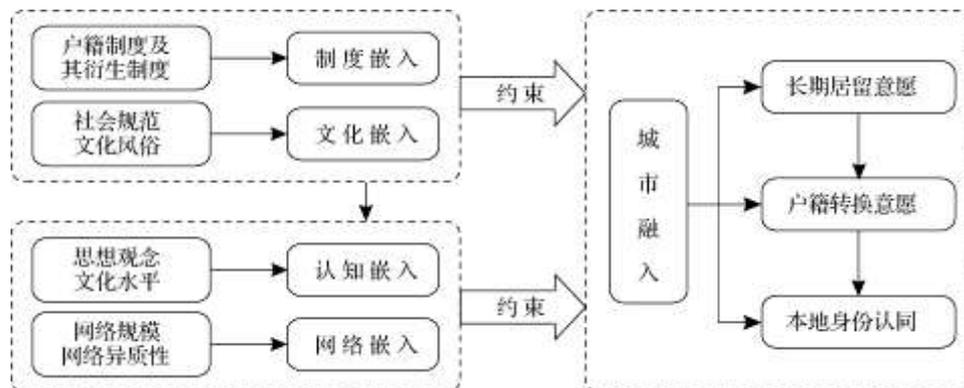


图 1 社会嵌入视角的二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分析框架

假说 1:户籍制度及其衍生制度(制度嵌入)阻碍了二代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

从文化嵌入来看,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城乡隔离状态,城乡之间已经越来越具有两个时代或两个文明的含义。二代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关系到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的发展转型问题,文化与行为方式的不同、经济生活差距以及部分城镇居民的偏见等,造成二代流动人口对城市生活的适应性与归属感缺乏,导致二代流动人口与城市原居民两大群体间存在隔阂、疏离,甚至是摩擦和冲突,形成了二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文化障碍。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2:对老家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的保有度(文化嵌入)越低,二代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程度越高。

从认知嵌入来看,虽然二代流动人口的文化程度和参加职业培训的比例都高于第一代,但仍然不能满足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素质的需求,由此限制了他们所能从事的职业和工种,工资收入较低,难以负担较高的城镇定居、生活和发展成本,也很难满足部分城市积分入户的条件。此外,受传统思维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大多数二代流动人口对自身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的提高缺乏再投资的经济意愿和能力,导致其就业竞争能力不足,无法在城市长期立足和发展(何军,2020)。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3:受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认知嵌入)越高,二代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程度越高。

从网络嵌入来看,以亲缘、地缘为纽带形成的交际圈,对传统乡土网络的依赖性高,会大大降低二代流动人口的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而本地交往网络扩大了二代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半径,在这一社会网络的塑造、强化过程中,二代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的交往得到加强,二代流动人口对城市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的了解也得到加强,从而增进了二代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之间的了解与认同,培养共同体意识与城市认同感。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4:社会网络异质性程度(网络嵌入)越高,二代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程度越高。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1. 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实施的 2017 年中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的 A 模块,即“流动人口问卷调查”,该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 PPS 抽样方法,调查范围涵盖全国 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查对象为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 15 周岁及以上的男性和女性流动人口,调查内容涉及流动人口的就业情况、流动及居留意愿、健康与公共服务、社会融合等信息。该调查覆盖范围广、样本量大,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能够全方位地刻画二代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状况。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本文抽取其中首次流动年龄为 0-15 周岁(即 0-15 周岁之间流入到或出生于当前流入地城市)的受访者作为研究对象(即二代流动人口),剔除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最终获得 18488 个有效样本。

2. 变量选择与描述

(1)被解释变量为二代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状况,本文在借鉴王春超和张呈磊(2017)研究的基础上,通过长期居留意愿、户籍转换意愿和本地身份认同三个有一定递进关系的指标来衡量二代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①长期居留意愿,通过“今后一段时间,您是否打算继续留在本地?”和“如果您打算留在本地,您预计自己将在本地留多久?”两个问题的回答来测度,本文将打算

在本地居住 5 年以上的赋值为 1, 否则为 0, 样本范围内打算在本地长期居住的二代流动人口 8299 人, 占比为 44.89%。②户籍转换意愿, 通过“如果您符合本地落户条件, 您是否愿意把户口迁入本地?”问题的回答来衡量, 本文将“不愿意”和处在不确定状态的“没想好”合并, 赋值为 0, 将“愿意”赋值为 1, 样本范围内 7140 位受访者有户籍转换意愿, 比重为 38.62%。③本地身份认同, 通过流动人口回答“我觉得我已经是本地人了”问题来测度, 本文将“完全不同意”和“不同意”赋值为 0, “基本同意”和“完全同意”赋值为 1, 样本范围内认同本地身份的二代流动人口 13522 人, 比例为 73.14%。

(2)解释变量为社会嵌入, 本文从制度嵌入、文化嵌入、认知嵌入和网络嵌入四个维度切入, 选取户籍状况表征制度嵌入, 选取文化风俗表征文化嵌入, 选取受教育程度表征认知嵌入, 选取社会网络表征网络嵌入。各变量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①户籍状况, 通过“户口性质”问题的回答来测度, 将“农业”和“农业转居民”合并为农业户口, 赋值为 1, 其他视为非农业户口, 赋值为 0, 样本范围内农业户口的二代流动人口 16272 人, 占比为 88.01%;②文化风俗, 通过流动人口回答“按照老家的风俗习惯办事对我比较重要”问题来测度, 本文将“完全不同意”和“不同意”赋值为 0, “基本同意”和“完全同意”赋值为 1, 样本范围内赞同的二代流动人口 9879 人, 比例为 53.43%;③受教育程度, 本文将“高中及以上”赋值为 1, “高中以下”赋值为 0, 样本范围内高中及以上的二代流动人口 6785 人, 比重为 36.70%;④社会网络, 通过“您业余时间在本地和谁来往最多(不包括顾客及其他亲属)”问题的回答来衡量, 本文将“本地人”赋值为 1, 其他人赋值为 0, 样本范围内 6364 位受访者主要和本地人交往, 比例为 34.42%。

(3)控制变量, 依据 2017 年中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流动人口问卷, 并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 本文控制了可能影响二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变量, 包括受访者的个体特征(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健康状况)、流动特征(本地留居时间、流动范围)和家庭特征(家庭月收入)等。各变量的含义及其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

表 1 变量的含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和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长期居留意愿	是=1, 否=0	0.449	0.497	0	1
户籍转换意愿	是=1, 否=0	0.386	0.487	0	1
本地身份认同	是=1, 否=0	0.731	0.443	0	1
户籍状况	农业户口=1, 非农业户口=0	0.880	0.325	0	1
文化风俗	是=1, 否=0	0.534	0.499	0	1
受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上=1, 高中以下=0	0.367	0.482	0	1
社会网络	本地人=1, 其他人=0	0.344	0.475	0	1
性别	男性=1, 女性=0	0.542	0.498	0	1
年龄	受访者 2017 的年龄(周岁)	27.529	7.262	15	59
年龄平方	年龄×年龄	810.552	448.314	225	3481
婚姻状况	在婚(已婚或再婚)=1, 不在婚(未婚、离异或丧偶)=0	0.634	0.482	0	1
健康状况	生活不能自理=1, 不健康但能自理=2, 基本健康=3, 健康=4	3.861	0.382	1	4
本地留居时间	受访者到所在城市居住的时间(年)	7.183	7.174	0	57

流动范围	跨省流动=1,省内跨市=2,市内跨县=3	1.638	0.747	1	3
收入水平	受访者家庭人均月收入的自然对数	8.709	0.777	0	12.206

3. 模型设定

由于被解释变量二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长期居留意愿、户籍转换意愿和本地身份认同)为二值变量,因而本文采用 Logit 模型进行估计,其模型表达式为:

$$y_i^* = \alpha + \beta s_i + \gamma X_i + \epsilon_i, y_i = \begin{cases} 1, y_i^* > 0 \\ 0, y_i^* \leq 0 \end{cases} \quad (1)$$

如式(1)所示, y_i^* 表示二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潜变量。当 $y_i^* > 0$ 时, $y_i=1$, 否则 $y_i=0$ 。 s_i 表示二代流动人口的社会嵌入状况(户籍状况、文化风俗、受教育程度和社会网络), X_i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α 、 β 、 γ 为待估参数, ϵ_i 为随机扰动项。

四、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的核心目标在于考察社会嵌入对二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首先,将户籍状况、文化风俗、受教育程度和社会网络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并运用 Logit 模型进行估计。其次,考虑到实证分析中可能出现的内生性问题,通过变量调整和数据调整进一步检验实证结果的可信度。最后,从迁入城市和迁徙个体两个视角,分析了社会嵌入对二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影响的异质性。

1. 基准分析

表 2 汇报了基于 Logit 模型的社会嵌入对二代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第(1)列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户籍状况,第(2)列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文化风俗,第(3)列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受教育程度,第(4)列的核心解释变量为社会网络,第(5)列将上述四个核心解释变量均纳入回归模型。整体来看,模型运行良好,各列的 Wald 卡方值均在 1% 的统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影响方向与显著性水平在各列之间也没有显著变化,反映出模型估计结果较强的稳健性。从第(5)列结果来看,户籍状况、文化风俗、受教育程度和社会网络四个社会嵌入相关变量与二代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均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从制度嵌入来看,相比于非农业户口,农业户口明显抑制了二代流动人口在城市的长期居留意愿。从文化嵌入来看,对老家传统文化风俗的保有度也显著阻碍了二代流动人口在城市的长期居留意愿。从认知嵌入来看,相比于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二代流动人口,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二代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明显更高。从网络嵌入来看,相比于业余时间与其他人交往为主的二代流动人口,业余时间与本地人交往为主的异质性社交网络能够显著提升二代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

在控制变量方面,男性二代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要明显低于女性,年龄对二代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呈现典型的倒“U”形分布态势,而在婚二代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要明显高于不在婚二代流动人口。二代流动人口在本地留居时间越久,流动范围和流动半径越小,家庭收入水平越高,长期居留意愿越强。

表 2 社会嵌入对二代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

变量	长期居留意愿				
	(1)	(2)	(3)	(4)	(5)
户籍状况	-0.547***				-0.253***
	(0.050)				(0.052)
文化风俗		-0.416***			-0.315***
		(0.032)			(0.033)
受教育程度			0.658***		0.498***
			(0.035)		(0.037)
社会网络				0.679***	0.558***
				(0.035)	(0.035)
性别	-0.162***	-0.155***	-0.148***	-0.172***	-0.131***
	(0.033)	(0.033)	(0.033)	(0.033)	(0.033)
年龄	0.146***	0.152***	0.139***	0.154***	0.138***
	(0.016)	(0.016)	(0.016)	(0.016)	(0.017)
年龄平方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婚姻状况	0.290***	0.291***	0.402***	0.308***	0.464***
	(0.046)	(0.046)	(0.047)	(0.046)	(0.048)
健康状况	0.011	0.007	-0.018	-0.006	-0.041
	(0.043)	(0.043)	(0.043)	(0.043)	(0.044)
本地留居时间	0.073***	0.072***	0.071***	0.066***	0.065***
	(0.002)	(0.002)	(0.003)	(0.003)	(0.003)
流动范围	0.480***	0.487***	0.442***	0.409***	0.381***
	(0.022)	(0.022)	(0.022)	(0.022)	(0.023)
收入水平	0.311***	0.317***	0.266***	0.317***	0.248***
	(0.035)	(0.035)	(0.033)	(0.036)	(0.033)
常数项	-6.163***	-6.588***	-6.374***	-6.868***	-5.740***
	(0.411)	(0.406)	(0.393)	(0.408)	(0.403)

Wald 卡方值	1839.112***	1906.582***	2033.978***	2054.128***	2292.301***
PseudoR ²	0.094	0.096	0.104	0.105	0.120
观测值	18488	18488	18488	18488	18488

注：***、**、*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表 3 汇报了社会嵌入对二代流动人口户籍转换意愿和本地身份认同的基准分析结果。从第(1)和(2)列结果来看，户籍状况、文化风俗、受教育程度和社会网络四个社会嵌入相关变量对二代流动人口的户籍转换意愿和本地身份认同的影响均在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以户籍为代理的制度嵌入对二代流动人口的户籍转换意愿和本地身份认同均有显著的阻碍作用，相比于非农业户口，农业户口明显抑制了二代流动人口的户籍转换意愿和本地身份认同。同时，以文化风俗为表征的文化嵌入也显著阻碍了二代流动人口的户籍转换意愿和本地身份认同，对老家传统文化风俗的保有度明显抑制了二代流动人口的户籍转换意愿和本地身份认同。然而，以受教育程度为表征的认知嵌入和以社会网络为表征的网络嵌入则能够显著增强二代流动人口的户籍转换意愿和本地身份认同，相比于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二代流动人口，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二代流动人口的户籍转换意愿和本地身份认同明显更高，相比于业余时间与其他人交往为主的二代流动人口，业余时间与本地人交往为主能够显著提升二代流动人口的户籍转换意愿和本地身份认同。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制度嵌入和文化嵌入显著阻碍了二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这可能是由于虽然现在户籍的身份属性在下降，但是与户籍关联的公共服务属性依旧很强，并且即使二代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文化适应程度很高，但老家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影响依旧深刻，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融入城市，故研究假说 1 和 2 成立。此外，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认知嵌入和网络嵌入能够促进二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这可能是缘于二代流动人口生于或长于城市，其童年和少年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城市里度过的，对城市的认知程度较高，社会关系网络也以本地人为主，因而更容易融入城市生活，故研究假说 3 和 4 成立。

表 3 社会嵌入对二代流动人口户籍转换意愿和本地身份认同的影响

变量	户籍转换意愿	本地身份认同
	(1)	(2)
户籍状况	-0.624***(-0.048)	-0.266***(-0.063)
文化风俗	-0.285***(-0.031)	-0.068*(-0.036)
受教育程度	0.238***(-0.035)	0.254***(-0.041)
社会网络	0.157***(-0.035)	0.875***(-0.044)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1.644***(-0.33)	-0.526(-0.368)
Wald 卡方值	807.432***	1673.879***

PseudoR ²	0.035	0.104
观测值	18488	18488

2. 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实证分析中可能出现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通过尽可能控制更多解释变量, 避免因遗漏变量导致估计有偏。为了进一步验证分析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运用变量调整和数据调整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 4。

(1) 调整被解释变量。

本文先对三个被解释变量的赋值进行调整, 再运用与被解释变量高度相关的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其中, 长期居留意愿方面, 将“不愿意”和“没想好”赋值为 1, “1-2 年”赋值为 2, “3~5 年”赋值为 3, “6~10 年”赋值为 4, “10 年以上”和“定居”赋值为 5; 户籍转换意愿方面, 将“不打算、没想好、打算”三个选项分别赋值为“1、2、3”; 本地身份认同方面, 将“完全不同意、不同意、基本同意、完全同意”四个选项分别赋值为“1、2、3、4”。此外, 还采用城市融入意愿来衡量二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状况, 通过“我很愿意融入本地人当中, 成为其中一员”问题的回答来测度, 将“完全不同意、不同意、基本同意、完全同意”四个选项分别赋值为“1、2、3、4”。由于四个变量是典型的排序变量, 因此, 本文使用 OrderedLogit 模型进行回归。如表 4 第(1)至(4)列所示, 调整被解释变量后, 估计结果与前文也保持一致, 充分表明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 4 调整变量和数据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调整被解释变量				调整数据		
	长期居留意愿	户籍转换意愿	本地身份认同	城市融入意愿	长期居留意愿	户籍转换意愿	本地身份认同
	(1)	(2)	(3)	(4)	(5)	(6)	(7)
户籍状况	-0.309*** (0.048)	-0.526*** (0.050)	-0.223*** (0.045)	-0.172*** (0.047)	-0.404** (0.184)	-0.527*** (0.167)	-0.357* (0.209)
文化风俗	-0.269*** (0.028)	-0.193*** (0.028)	-0.221*** (0.029)	-0.371*** (0.030)	-0.618*** (0.111)	-0.180* (0.105)	-0.250** (0.118)
受教育程度	0.389*** (0.033)	0.167*** (0.032)	0.170*** (0.031)	0.251*** (0.032)	0.243* (0.124)	-0.130 (0.115)	0.320** (0.126)
社会网络	0.476*** (0.033)	0.102*** (0.032)	0.730*** (0.032)	0.482*** (0.032)	0.658*** (0.128)	0.327*** (0.119)	0.713*** (0.149)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Wald 卡方值	2224.222***	581.444***	2576.956***	1289.287***	210.059***	75.135***	129.436***
PseudoR ²	0.052	0.016	0.064	0.039	0.130	0.037	0.086

观测值	18488	18488	18488	18488	1601	1601	1601
-----	-------	-------	-------	-------	------	------	------

(2) 调整数据。

本文使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实施的 2017 年中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的 C 模块，即“八城市流动人口问卷调查”，进行重新回归。该调查选取江苏省苏州市、山东省青岛市、河南省郑州市、湖南省长沙市、广东省广州市、重庆市九龙坡区、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8 个城市(区)，开展流动人口健康重点领域专题调查，该问卷中本文关注的核心变量的衡量方式相同，故采取同样的数据处理方式进行分析，共获得 1601 个有效样本。如表 4 第(5)至(7)列所示，使用 2017 年八城市(区)流动人口问卷调查的估计结果与前文分析基本一致，除受教育程度对二代流动人口户籍转换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外，绝大多数核心解释变量的影响方向与显著性未发生明显变化，反映出回归结果具有很强的稳健性。

3. 异质性分析

上述分析已经证实社会嵌入会显著影响二代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不过，上述结果只是平均意义上的估计结果，并未考虑二代流动人口群体的内部差异。接下来将分析社会嵌入对不同迁入地区、不同迁徙个体二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异质性。其中，按照迁入地区分类将二代流动人口分为迁入省会城市或非省会城市两类。样本范围内，迁入省会城市的二代流动人口 7598 人，占比为 41.10%；迁入非省会城市的二代流动人口 10890 人，占比为 58.90%。从国际经验看，二代移民主要包括 1.5 代移民和 2 代移民。因此，本文借鉴段成荣和靳永爱(2017)的做法，根据首次外出流动年龄，将 0~6 周岁的流动人口划定为 2 代流动人口，7~15 周岁的流动人口划定为 1.5 代流动人口。样本范围内，1.5 代流动人口 16007 人，占比为 86.58%；2 代流动人口 2481 人，占比为 13.42%。

从迁入地区来看(见表 5)，总体上，制度嵌入和文化嵌入对二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阻碍效应依然存在，并且文化嵌入和网络嵌入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这与基准分析的实证结果基本一致。进一步，检验组间系数差异的 Suest 值分别在 1%、1%、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按迁入地区划分的两组样本的确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以户籍为代理的制度嵌入对迁入省会城市的二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阻碍效应更明显，说明迁入省会城市的二代流动人口对制度嵌入更为“敏感”；以文化风俗为表征的文化嵌入对迁入非省会城市的二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阻碍效应更明显，说明省会城市的包容性更强；以受教育程度为表征的认知嵌入与以社会网络为表征的网络嵌入均对迁入省会城市的二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说明相比于非省会城市，省会城市能够集聚高层次人才和延展社交网络。

表 5 迁入地区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长期居留意愿		户籍转换意愿		本地身份认同	
	省会城市	非省会城市	省会城市	非省会城市	省会城市	非省会城市
	(1)	(2)	(3)	(4)	(5)	(6)
户籍状况	-0.341***	-0.106	-0.743***	-0.458***	-0.295***	-0.234***
	(0.077)	(0.073)	(0.073)	(0.068)	(0.090)	(0.089)
文化风俗	-0.265***	-0.363***	-0.227***	-0.344***	-0.077	-0.064
	(0.051)	(0.043)	(0.049)	(0.042)	(0.056)	(0.047)

受教育程度	0.589***	0.354***	0.297***	0.095**	0.281***	0.226***
	(0.056)	(0.049)	(0.054)	(0.048)	(0.061)	(0.056)
社会网络	0.591***	0.550***	0.184***	0.133***	0.893***	0.858***
	(0.056)	(0.047)	(0.053)	(0.046)	(0.068)	(0.059)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4.863***	-6.228***	-1.291**	-1.688***	-0.201	-0.634
	(0.625)	(0.510)	(0.527)	(0.431)	(0.559)	(0.495)
Wald 卡方值	1031.636***	1361.470***	553.086***	329.463***	621.623***	1065.226***
PseudoR ²	0.127	0.122	0.059	0.025	0.089	0.116
观测值	7598	10890	7598	10890	7598	10890
Suest	56.83***		148.88***		18.63*	

从迁徙个体来看(见表6),总体上,社会嵌入对1.5代流动人口和2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存在鲜明差异,检验组间系数差异的Suest值分别在1%、1%、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进一步证实了两组样本的确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以户籍为代理的制度嵌入对1.5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阻碍效应更明显,说明相比于2代流动人口,1.5代流动人口受户籍及其衍生制度的影响更大;以文化风俗为表征的文化嵌入对2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阻碍效应更明显,说明2代流动人口受老家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影响更大;以受教育程度为表征的认知嵌入对1.5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这可能是因为相比于1.5代流动人口,2代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的时间更长,对城市的认知程度较高,故认知嵌入的作用不明显;以社会网络为表征的网络嵌入对2代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和本地身份认同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而对1.5代流动人口户籍转换意愿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表6 迁徙个体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长期居留意愿		户籍转换意愿		本地身份认同	
	1.5代流动人口	2代流动人口	1.5代流动人口	2代流动人口	1.5代流动人口	2代流动人口
	(1)	(2)	(3)	(4)	(5)	(6)
户籍状况	-0.278***	-0.067	-0.672***	-0.372***	-0.272***	-0.195
	(0.057)	(0.132)	(0.053)	(0.119)	(0.067)	(0.185)
文化风俗	-0.281***	-0.421***	-0.266***	-0.327***	-0.053	-0.100
	(0.035)	(0.089)	(0.034)	(0.083)	(0.038)	(0.123)
受教育程度	0.522***	0.155	0.250***	0.055	0.272***	-0.053
	(0.041)	(0.094)	(0.039)	(0.089)	(0.044)	(0.128)

社会网络	0.539***	0.557***	0.154***	0.094	0.836***	1.099***
	(0.039)	(0.090)	(0.038)	(0.085)	(0.047)	(0.136)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6.535***	-4.239***	-2.134***	-0.503	-1.199***	3.525***
	(0.460)	(0.861)	(0.369)	(0.789)	(0.394)	(1.251)
Wald 卡方值	2001.754***	251.560***	679.376***	76.109***	1390.242***	187.259***
PseudoR ²	0.120	0.093	0.034	0.023	0.094	0.107
观测值	16007	2481	16007	2481	16007	2481
Suest	34.81***		26.56***		19.81**	

五、进一步讨论

上述分析表明，制度嵌入和文化嵌入显著阻碍了二代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而认知嵌入和网络嵌入有助于促进二代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不论是长期居留意愿、户籍转换意愿还是本地身份认同，社会嵌入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社会嵌入是如何影响二代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的？其中的影响机制是什么？下面本文结合数据情况，从社区环境和城市感知两方面探寻合理的解释。一方面，社区是城市社会的基本单元，也是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的组织载体与空间场域，完善的社会基础环境增进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交流互动机会，拉近两者的社会距离(祝仲坤等，2019;陆万军等，2020)。另一方面，社会嵌入能够显著影响流动人口对其与城市的互动关系和其生活质量的主观感知，进而加速其融入于城市社会(褚荣伟等，2012)，段学芬和王瑞娟(2012)也认为农民工对城市区位的感知印象、对相关的城市制度、管理体系的感知印象，以及其在城市的生活感受显著影响着农民工的市民化。

为了验证上述两方面逻辑，本文将从健康档案和健康教育两个方面考察二代流动人口所在社区的环境状况，其中，通过“本地是否给您建立了居民健康档案？”问题的回答来测度健康档案状况，将“是，已经建立”赋值为1，“没建，没听说过”“没建，但听说过”以及“不清楚”赋值为0，样本范围内建立健康档案的二代流动人口4677人，占比为25.30%；通过“您在现居住村/居是以何种方式接受上述健康教育的？”问题的回答来测度健康教育情况，活动包括健康知识讲座、宣传资料(纸质、影视)、宣传栏/电子显示屏、公众健康咨询活动、社区短信/微信/网站、个体化面对面咨询等六项，将接受过其中一项及以上活动的赋值为1，均未接受过的赋值为0，样本范围内接受过健康教育的二代流动人口11944人，占比为64.60%。同时，从城市接受度和城市认知度来衡量二代流动人口对务工地的感知情况。其中，通过“我喜欢我现在居住的城市/地方”问题的回答来测度城市接受度，本文将“完全不同意”和“不同意”赋值为0，“基本同意”和“完全同意”赋值为1，样本范围内赞同的二代流动人口17918人，比例为96.92%；通过“我关注我现在居住城市/地方的变化”问题的回答来测度城市认知度，本文将“完全不同意”和“不同意”赋值为0，“基本同意”和“完全同意”赋值为1，样本范围内赞同的二代流动人口17497人，比例为94.64%。

此外，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来探究社会嵌入是否通过社会环境和城市感知影响二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设定中介效应方程组：

$$y_i = \alpha_3 + \beta_3 s_i + \gamma_3 X_i + \lambda_i \quad (2)$$

$$z_i = \alpha_4 + \beta_4 s_i + \gamma_4 X_i + \pi_i \quad (3)$$

$$y_i = \alpha_5 + \beta_5 s_i + \delta z_i + \gamma_5 X_i + \sigma_i \quad (4)$$

其中， z_i 为中介变量，包括健康档案、健康教育、城市接受度和城市认知度， λ_i 、 π_i 、 σ_i 分别为随机扰动项，其余参数设定与基准模型保持一致。根据中介效应模型的原理可知，将核心解释变量与中介变量均纳入模型后，若核心解释变量与中介变量都显著，且核心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下降，说明中介效应存在。

1. 社区环境机制

表 7 汇报了社会嵌入通过社会环境影响二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检验结果。第(1)列和第(5)列检验的是社会嵌入各相关变量和控制变量对中介变量(健康档案和健康教育)的影响，第(2)列至第(4)列、第(6)列至第(8)列检验的是中介变量(健康档案和健康教育)、社会嵌入各相关变量和控制变量同时纳入模型对二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第(1)列显示户籍状况和文化风俗对健康档案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受教育程度和社会网络对健康档案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第(2)列至第(4)列在同时控制健康档案、户籍状况、文化风俗、受教育程度和社会网络的情况下，健康档案对二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长期居留意愿、户籍转换意愿、本地身份认同)依然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此同时，户籍状况和文化风俗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且较基准回归的系数更大，受教育程度和社会网络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且较基准回归的系数更小，说明健康档案是社会嵌入影响二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渠道之一。同理，第(5)列至第(8)列的结果显示，健康教育也是文化风俗、受教育程度和社会网络影响二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渠道之一，而户籍状况对健康教育的影响不显著，说明健康教育不是户籍状况影响二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渠道。由此，基本验证了以健康档案和健康教育为表征的社区环境是社会嵌入影响二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重要渠道。

2. 城市感知机制

表 8 汇报了社会嵌入通过城市感知影响二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检验结果。第(1)列和第(5)列检验的是社会嵌入各相关变量和控制变量对中介变量(城市接受度和城市认知度)的影响，第(2)列至第(4)列、第(6)列至第(8)列检验的是中介变量(城市接受度和城市认知度)、社会嵌入各相关变量和控制变量同时纳入模型对二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第(1)列显示文化风俗对城市接受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社会网络对城市接受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第(2)列至第(4)列在同时控制城市接受度、户籍状况、文化风俗、受教育程度和社会网络的情况下，城市接受度对二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长期居留意愿、户籍转换意愿、本地身份认同)依然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此同时，文化风俗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且较基准回归的系数更大，社会网络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且较基准回归的系数更小，说明城市接受度是文化嵌入和网络嵌入影响二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渠道之一，而户籍状况和受教育程度对城市接受度的影响不显著，说明城市接受度不是户籍状况和受教育程度影响二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渠道。同理，第(5)列至第(8)列的结果显示，城市认知度也是受教育程度和社会网络影响二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渠道之一，而户籍状况和文化风俗对城市认知度的影响不显著，说明城市认知度不是户籍状况和文化风俗影响二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渠道。由此，大体上验证了以城市接受度和城市认知度为表征的城市感知是社会嵌入影响二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重要渠道。

表 7 社区环境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健康档案	长期居留意愿	户籍转换意愿	本地身份认同	健康教育	长期居留意愿	户籍转换意愿	本地身份认同
	(1)	(2)	(3)	(4)	(5)	(6)	(7)	(8)
健康档案		0.200***	0.193***	0.345***				

		(0.037)	(0.035)	(0.044)				
健康教育						0.105***	0.117***	0.342***
						(0.034)	(0.033)	(0.037)
户籍状况	-0.105**	-0.249***	-0.620***	-0.261***	0.027	-0.253***	-0.624***	-0.270***
	(0.053)	(0.052)	(0.049)	(0.063)	(0.052)	(0.052)	(0.048)	(0.063)
文化风俗	-0.123***	-0.311***	-0.281***	-0.061*	-0.074**	-0.313***	-0.283***	-0.062*
	(0.035)	(0.033)	(0.031)	(0.036)	(0.032)	(0.033)	(0.031)	(0.036)
受教育程度	0.157***	0.493***	0.233***	0.245***	0.198***	0.493***	0.233***	0.238***
	(0.039)	(0.037)	(0.035)	(0.041)	(0.036)	(0.037)	(0.035)	(0.041)
社会网络	0.250***	0.549***	0.148***	0.861***	0.182***	0.554***	0.153***	0.864***
	(0.038)	(0.035)	(0.035)	(0.044)	(0.036)	(0.035)	(0.035)	(0.044)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2.706***	-5.758***	-1.644***	-0.496	-1.528***	-5.771***	-1.667***	-0.560
	(0.356)	(0.405)	(0.331)	(0.368)	(0.324)	(0.404)	(0.331)	(0.369)
Wald 卡方值	398.001***	2310.056***	831.254***	1719.756***	568.658***	2308.398***	817.778***	1757.881***
PseudoR ²	0.018	0.121	0.036	0.107	0.027	0.120	0.036	0.108
观测值	18488	18488	18488	18488	18488	18488	18488	18488

表 8 城市感知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城市接受度	长期居留意愿	户籍转换意愿	本地身份认同	城市认知度	长期居留意愿	户籍转换意愿	本地身份认同
	(1)	(2)	(3)	(4)	(5)	(6)	(7)	(8)
城市接受度		0.984***	0.876***	1.516***				
		(0.110)	(0.108)	(0.099)				
城市认知度						0.949***	0.868***	1.404***
						(0.086)	(0.084)	(0.074)
户籍状况	-0.017	-0.253***	-0.625***	-0.270***	0.018	-0.255***	-0.629***	-0.273***
	(0.151)	(0.053)	(0.049)	(0.064)	(0.122)	(0.053)	(0.049)	(0.064)

文化风俗	0.161*	-0.320***	-0.289***	-0.081**	0.037	-0.319***	-0.287***	-0.074**
	(0.087)	(0.033)	(0.031)	(0.036)	(0.067)	(0.033)	(0.031)	(0.036)
受教育程度	0.147	0.497***	0.236***	0.253***	0.599***	0.478***	0.219***	0.213***
	(0.105)	(0.037)	(0.035)	(0.041)	(0.084)	(0.037)	(0.035)	(0.041)
社会网络	0.345***	0.553***	0.150***	0.869***	0.564***	0.543***	0.141***	0.849***
	(0.102)	(0.035)	(0.035)	(0.045)	(0.084)	(0.036)	(0.035)	(0.045)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1.500*	-6.673***	-2.454***	-1.858***	-1.305**	-6.495***	-2.309***	-1.474***
	(0.826)	(0.421)	(0.346)	(0.385)	(0.600)	(0.412)	(0.339)	(0.381)
Wald 卡方值	86.184***	2339.846***	863.937***	1856.310***	255.138***	2379.151***	897.922***	1975.374***
PseudoR ²	0.018	0.124	0.038	0.116	0.041	0.125	0.040	0.122
观测值	18488	18488	18488	18488	18488	18488	18488	18488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社会嵌入理论构建二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分析框架，从制度嵌入、文化嵌入、认知嵌入和网络嵌入四个角度理解社会嵌入影响二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内在逻辑。随后，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中的流动人口问卷调查展开严谨的实证分析。研究表明：①社会嵌入是影响二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制度嵌入和文化嵌入显著阻碍了二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而认知嵌入和网络嵌入能够促进二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通过调整变量和调整数据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②社会嵌入对二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在不同迁入地区、不同迁徙个体之间存在差异，制度嵌入的阻碍效应发生在迁入省会城市和1.5代流动人口样本中，而文化嵌入的阻碍效应发生在迁入非省会城市和2代流动人口样本中，认知嵌入和网络嵌入的促进作用发生在迁入省会城市和1.5代流动人口样本中；③社区环境和城市感知是社会嵌入影响二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重要渠道，良好的社区环境与较强的城市感知能够稀释制度嵌入和文化嵌入的阻碍效应，强化认知嵌入和网络嵌入的促进作用。通过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出以下几点政策启示。

第一，加强制度融合，创新城市融入机制。虽然现在户籍的身份属性在下降，但是与户籍关联的公共服务属性依旧很强。政府应该通过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公共服务上的不平等，为流动人口融入城市创造必要的条件；并进一步完善劳动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为劳动力市场发育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消除农村劳动力流动壁垒，从而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此外，还需不断深化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改革，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为农业转移人口与城市的融合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和良好的制度环境。第二，增进文化交流，打通社会融合通道。虽然二代流动人口生长于城市，并对流入地的文化适应程度很高，但老家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影响依旧深刻。政府应该以开放和包容的姿态推进城市社区建设，并充分发挥社区的社会融合功能，组织动员社区各方面力量为二代流动人口提供帮助和服务，改善其生活环境和条件；此外，积极开展跨地区文化交流活动，并拓展交流渠道与形式，加强外来人口与本地市民之间在思想、理念、情感等方面的联系与沟通，促进在文化意识、生活模式等方面的相互接纳与认可。第三，提升人力资本，提高城市融入质量。虽然二代流动人口的文化程度和参加职业培训的比例都高于第一代，但仍然不能满足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素质的需求。政府要转变思想，重视流动人口尤其是农业转移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努力创新，引入市场机制，开拓资金来源，以吸取充足的资金，并积极建立和完善农业转移人口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法律、规章和

制度等，同时严格监督落实；此外，二代流动人口也要强化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城市融入度和适应性，主动克服心理障碍，从而提高自身城市融入质量。第四，拓展社会网络，加快融入城市步伐。虽然二代流动人口生于或长于城市，但其实际支持网、情感支持网和交往支持网依然是以家人、亲戚、老乡和朋友构成的强关系为主。政府应该重视二代流动人口所在单位和社区的力量发挥，推动二代流动人口扩展社会交往半径，鼓励二代流动人口多与工作单位及所在社区的本地人交往，增强二代流动人口社会网络的异质性水平，减少二代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的疏离感。

参考文献:

- [1].Portes,A.,and M.Zhou.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Segmented Assimilation and Its Variants.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1993,530:74-96.
- [2].Gans,H. J.Second-Generation Decline:Scenarios for the Economic and Ethnic Futures of the Post-1965 American Immigrants.Ethnic & Racial Studies,1992,15(2):173-192.
- [3].Zhou,M.Growing Up American:The Challenge Confronting Immigrant Children and Children of Immigrants.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97,23(1):63-95.
- [4].Granovetter,M.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91(3):481-510.
- [5].周皓:《中国人口流动模式的稳定性及启示——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数据的思考》,《中国人口科学》2021年第3期。
- [6].段成荣、靳永爱:《二代流动人口——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新划分与新界定》,《人口与经济》2017年第2期。
- [7].张庆武、卢晖临、李雪红:《流动人口二代社会融入状况的实证研究——基于北京市的问卷调查分析》,《中国青年研究》2015年第7期。
- [8].路锦非:《中国城市移民二代的社会融入测量研究——理论反思与实证检验》,《公共管理学报》2018年第2期。
- [9].林李月、朱宇、柯文前:《城镇化进程中二代流动人口市民化水平及影响因素》,《人文地理》2021年第1期。
- [10].侯力、解柠羽:《城市农民工二代移民社会融入的障碍研究》,《人口学刊》2010年第6期。
- [11].段成荣、马学阳:《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新”状况》,《人口与经济》2011年第4期。
- [12].梁宏:《生命历程视角下的“流动”与“留守”——第二代农民工特征的对比分析》,《人口研究》2011年第4期。
- [13].李巧、梁在:《二代流动儿童回流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人口研究》2019年第3期。
- [14].祝仲坤、冷晨昕:《自雇行为如何影响农民工的市民化状态——来自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经验证据》,《南开经济研究》2020年第5期。

-
- [15]. 何军:《整合多方资源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国家治理》2020年第36期。
- [16]. 王春超、张呈磊:《子女随迁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感》,《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2期。
- [17]. 祝仲坤、冷晨昕、陶建平:《社区场域与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 [18]. 陆万军、赵晶晶、李放:《住房属性、居住区位与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兰州学刊》2020年第9期。
- [19]. 褚荣伟、肖志国、张晓冬:《农民工城市融合概念及对城市感知关系的影响——基于上海农民工的调查研究》,《公共管理学报》2012年第1期。
- [20]. 段学芬、王瑞娟:《农民工的城市感知与农民工的市民化》,《学术界》2012年第11期。
- [21]. 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心理科学进展》2014年第5期。